

编者按：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马克·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迪亚斯(Marco Antonio Rodrigues Dia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前高教处处长，国际高等教育专家。1970—1981年，任巴西利亚大学教授，1976—1980年任巴西利亚大学副校长。1981年10月—1999年2月，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教处处长。其间，先后主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400多个“双边合作”国际项目。1998年10月5—9日，迪亚斯教授负责主办了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183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共计4000多名参会者出席。他负责起草了《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Higher Education: Vision and Action for the Coming Century)及《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作为纲领性文件，由大会通过并在世界范围内颁布实施。其代表性著作还包括：New Trends in Interuniversity Cooperation at Global Level(1992)；Utopian Realism i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1997)；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for Graduate Employment(1998)；The University of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Conflict to th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2008)等。迪亚斯教授曾获巴西政府颁发的“卓越教育骑士勋章”(1993)、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骑士勋章”(1999)，并被阿根廷东北大学和萨尔塔大学、巴西马托格罗索联邦大学和帕拉联邦大学、捷克布尔诺大学、以色列亚马逊大学联合会等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起任联合国大学校长特别顾问。迪亚斯教授于2015年6月9日访问了苏州大学，本刊特邀杨习超副教授就国际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对他进行了访谈。

## 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问题与建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高教处处长迪亚斯教授专访

Marco Antonio Rodrigues Dias<sup>1</sup> 杨习超<sup>2\*</sup>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高教处, 巴黎 墨东 法国 92190; 2. 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在访谈中，迪亚斯教授提出如下主张：首先，在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理论前提下，大学有义务扮演好培养人力资源的角色，通过有社会针对性的课程项目为青年学生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其次，面临商业化、功利化的挑战，高等教育要积极履行社会道德批判功能，做好世界和平文化的代言人；再次，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要重视国际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人才流动和知识共享，同时大学要弘扬民族文化，避免成为个别发达国家大学模式的附属品；最后，迪亚斯教授期望，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理性发展高等教育，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

关键词：高等教育；新趋势；公共产品；社会责任；大学自治

作者简介：Marco Antonio Rodrigues Dias(1938—)，男，巴西里约热内卢人，博士，巴西利亚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前高教处处长，主要从事国际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杨习超(1972—)，男，河南获嘉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5)03-0071-10 收稿日期：2015-08-13

\* 通讯作者：杨习超，E-mail：yangxichao@163.com。

马克·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迪亚斯教授于1981年10月至1999年2月期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教处处长,主持召开了1998年的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通过了纲领性文件《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确立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为回应新世纪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在此次大会之后颁布实施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迪亚斯教授坚持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承担推进人类文化和和平的职责,期盼高等教育“乌托邦理想成真”!2015年6月9日,迪亚斯教授到访苏州大学,笔者(以下简称“杨”)受《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之邀,对迪亚斯教授(以下简称“迪”)进行了专访。

杨:尊敬的迪亚斯教授,您好,我想从您负责主办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谈起,我的问题是:您认为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还有,您对这次大会上与会国协商签署的几个主要文件有何评价?

迪:作为1998年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WCHE)的组织者,我做的工作是有限的,但是,大会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们认为,“1998宣言”是国际高等教育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为高等教育制度的分析和行动创立了一个框架,这也是这次会议取得的重要共识。事实上,最后签署的文件来之不易,是经过世界不同地区广泛协商和征求意见才达成的结果,得到了来自全球180多个国家,130多名政府部长率领的代表团的一致认可,出席本次大会的4000多人见证了这一时刻。中国派出了一个豪华的代表团,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为团长并被选为大会副主席。另外,有大批的民间团体、教授、学生、议员和各种文化、学术社团参与其中,他们的意见也有所响应。

我认为,这次大会就关于如何更好地融合高等教育机构、制度和社会,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框架建议与行动方案。从20世纪末直至今日,高等教育在全球快速发展的几十年,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但高等教育的四个主要功能和目标是没有变化的:一是新知识的产生(研究功能);二是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教育功能);三是为社会提供服务(服务功能);四是社会价值批判(道德功能)。<sup>[1]</sup>

另外,作为社会的子系统,高等教育在本质上必须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1998年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出的全球高等教育框架是崭新的理念,确立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以服务于高等教育的研究、育人、服务和道德四个目标。大会对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会确定的主要原则是高等教育深化转型的思想基础。我们期待的高等教育的转型将以平等、民主、公正和自由为指向,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使高等教育成为世界和平文化的有效推动主体。

第二,努力提升高等教育在教学和研究功能方面的整体性和有效性,通过连续性、终身教育等为每个个体提供平等的机会,确保任何具备高等教育学习资质者能够平等享受到高等教育。

第三,增进国际大学间的交流合作,包括所有参与高等教育的人员有国际合作机会。1998年之后,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世界高等教育的极度不平等、不平衡,这既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所导致,反过来,它又是各国间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源。之后召开的一系列区域性会议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将全球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待。

普及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是势在必行的,也是高等教育民主化的根本基础。此外,我们关注的是,确保满足青年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因他们的财产状况、性别、语言、家庭出身、政治及宗教信仰而受到限制。学生的学业特长、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才应该是决定他们能否进入高等教育层次的根本性依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是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教师。教育研究者通过研究合作确定教育的优先问题。另外,是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出来致力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研究的管理者和专家。考虑到这些,大家就会理解为什么应当从全局看待教育,所有的元素都是重要的。

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参与者还讨论了高等教育全球化和新技术的重要性,与会专家就全球化带来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展开讨论,为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提供充分依据。在这个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高等教育也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灵活。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需要处理好民主化、两极分化、区域化、边缘

化和碎片化的问题,这些现象都将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采取科学、理性的应对措施。新技术是一个现实问题,教育部门要确保新技术应当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社会的部分人群。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全球性开放体系,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高等教育视为单一民族的和个别区域的。未来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必须具备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并且在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获得机会。平等的知识转让,学生、教师及研究者的自由流动,对未来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所有形式的垄断,知识、技术的控制,对这个世界都是有害的,违背平等理念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处理好民主化、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关系。大会认为推进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和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推行素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不仅需要政府和高等院校的积极努力,而且需要所有相关人士,如学生及其家庭、教师、工商界、公共和私营经济部门、地区、专业协会等各方积极参与。其中,高等院校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确保公共或私人资金、国家或国际资金使用的可靠、公开、透明和实效。

可喜的是,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刚刚结束,几个主要国家就依据大会确定的原则,迅速推进本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其中就有中国代表团团长陈至立部长向中国政府提交的一份教育振兴报告,主要内容是大规模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增加高等教育资金投入,加强高等学校基础建设,建设出一批国际一流大学。我还记得,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闭幕式上,中国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作为会议特别发言者强调:“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将一个具有12亿人口的国家引向现代化,这是一项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大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之多,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解决这些问题显然离不开高等教育所拥有的智力资源,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sup>[2]</sup>

杨: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有哪些新的趋势?您对这些新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迪: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观今日之世界现状,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高等教育的商业化、教育项目内容的国际化、教育课程大纲的个体化等趋势会成为未来主导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利用虚拟教育、互联网积极应

对这些高等教育的新趋势,消除它们可能的负面影响,通过加强国际间高等教育合作,为全球数百万年轻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通过网络空间的“全球慕课”等方式,世界上的青年学子可以获得来自不同国家的教育资源。国际大学之间的合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挑战,而且是必要的。

趋势终究只是个认识问题。重要的是高等教育要通过培养合格的青年以全力服务社会。在当代,高等教育投资巨大,商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推进高等教育发展,但教育之目的不是成为商业化的盈利机器,高等教育承载着发扬、推动人类文明的重任,世界各国要把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对待。

所谓公共产品,意味着高等教育应当建立在以下三个原则基础之上:一是平等性,高等教育应当对所有合格的人开放,不能有任何歧视;二是持续与永久性,我们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必须是持续的,不得有任何中断;三是适应性与可调整性,高等教育须适应新形势,以保证教育目的的实现。

2003年6月23—25日,赛多(Seddoh)先生(来自多哥,1999年接替我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教处处长)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休之前,组织了一次高等教育合作会议,作为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5周年的纪念。那次会议通常叫作“WCHE+5”,会议的目标是对1998优先行动框架所取得进展的一次评估。这次会议很重要,尽管没有1998年大会那么大的规模,但也有来自约120个国家的400余名代表到巴黎参加了会议,堪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盛会。作为大会的准备,赛多先生安排了各个地区的报告,并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家委员会提供各个国家层面所做立法改革方面的信息,共收到了104个国家的回复。亚洲区的准备工作由王一兵先生负责,王先生当时是负责亚洲区域高等教育的联合国官员,他的工作地点是泰国首都曼谷。

那次会议是一次非常认真的尝试,希望把

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

迪亚斯教授在2013年12月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全球高等教育座谈会上做题为“Resistance and Submission in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his Beginning of Century”的报告中强调国际高等教育的合作。



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写入最后的公报。我当时是作为一名观察员参会的,联合国大学校长范·金克尔(Van Ginkel)先生邀请我作为联合国大学代表团的成员。会议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大家的争论很胶着,尤其是关于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Services,即《贸易服务总协定》)影响的讨论。参与者们当中占主导的意见是,《贸易服务总协定》的目标与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概念是相对立的。最后一天,有专家(一位非常严谨的加拿大专家)认为还是不要把这个概念写入报告。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权利和公共产品的目标当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是一些专家提到全球公共概念意味着应该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化的东西与具体社会需求的针对性是相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助理主任,英国人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考虑要通过文件并结束会议。有几个参与者把他们的书面抗议提交给了教科文组织。这里所提到的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也是世界银行的概念,被排斥了。赛多先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在修改大会文件时似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至于大会的文本在会议结束一年后才得以出版发行。(在这个报告之前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的特别报告。)这个文件好像比较符合政治规则,容易为大众接受,因为提出的平等术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传统概念,也是《贸易服务总协定》称道的处事方式。但是许多的参会者抗议这是个再清楚不过的政治操纵案例。

2008年,拉美人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会议上,重点提出了高等教育是社会公共产品这个概念并写入了会议公报。我认为这表明一种姿态,教育项目内容的国际化要依照这个姿态开展,以促进世界各国间的平等合作。高等教育以人类进步为目标,是一种公共产品,需要公共财政的供给,而不是盈利性企业,合格的毕业生才是高等教育的产品。高等教育项目内容的国际化有助于促进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搭建起国际间跨文化交流的平台。同时,高等教育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社会环境,与当地的历史和现实紧密联系。

最重要的是,确立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其效果超出了高等教育机构本身的意义。

杨:您刚才谈到高等教育的商业化、教育项目内容的国际化、教育课程大纲的个体化等趋势

会成为未来主导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不同,各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很不平衡,您认为确保发展的关键是什么?是加强政府调控,还是推动高校自治?

迪: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与灵魂,是制定所有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并且,质量也是国际大学间合作的基础与关键,甚至可以说,所谓的合作,事实上是售卖优质的教育产品。

1998年,参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所有个人和机构代表达成共识:质量是高等教育的“心脏”。但是,质量不是“空中楼阁”,良好的组织、管理,优越的校园设施条件包括实验室、图书馆等都是这座楼阁的重要部件。而且,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服务社会的能力,也就是说,要满足大众的社会文化需求。一所大学,如果仅仅限于复制一种外在的模式,就不可能具备这种能力。

比如说,有关民主问题的讨论,一些西方的分析家就认为,典型的民主模式是英国模式。但他们很难描述英国模式代表了什么,大英帝国的基础又是什么,全世界又有多少人受到英国模式的“滋养”?根据英国模式,两院制被看作是民主架构的模型,是不少国家崇拜的典型。其他国家的法官也要带上法官帽(假发),认为这是民主体制的象征,显然是滑稽可笑的。同样,全世界的大学委员会成员也不需要穿上和牛津大学教授一样的学者袍服,大学不需要刻意模仿某一种文化传统。在1997年7月10日《东京宣言》的第五条讨论的时候,参加高等教育亚洲区域会议的专家们提出:“既然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要避免高等教育沦为某几个教育强国和文化大国的附庸品。”<sup>[3]</sup>

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大学需要得到政府全方位的财政和政策支持,高等教育的质量确实受到大学所获财政资源的数量影响,但是,高等教

即2008年召开的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区域高等教育会议,对应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也称作“巴黎+10”会议。大会通过了宣言:Declaration and Action Plan of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7年7月8日至10日,亚洲区域高等教育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原中国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参赞、教科文组织亚太办事处高等教育专员王一兵教授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会议的主题是“针对21世纪的国家战略与区域合作”,会议发布了《高等教育亚太区宣言与行动计划》(Declaration about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Plan of Action),简称《东京宣言》。

育作为高度自治的学术活动,核心理念是自主办学和学术独立,这些也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要素。

杨:您在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中提出大学需要担当起“推进人类文化和平的代言人”,这个观点您也在后来的会议中曾多次提及。我可不可以将之理解为“大学应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我的理解是不是有点儿“乌托邦”?

迪:首先,我很高兴你能提到这个问题,同时,我也想说,乌托邦会成为现实。

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是巴西利亚大学的管理者,之后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高教处处长,我对高等教育机构所事任务之巨颇为感触,尤其是大学被全社会寄予厚望,它们被要求培养社会领袖,开展科学研究,发展知识智慧,开发人力资源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营造未来前景,培训各个层次的教师,推动文化进步,为社区提供不同的服务,充当人们学会共同居住的工具,消除各种有悖人文的歧视。因此,大学需要保持卓越。

正如你所提到的,大学正以其特定的方式,被要求成为“人类世界的中心”。这样的思考代表一种理想世界观,特别是理想的大学角色观。我认为这是个积极的态度,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努力把他们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投入到有益于整个社会福祉的行动中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上也有其他机构在努力扮演同样的角色,包括联合会、协会、政府机构等。例如,对很多人来说,宗教信仰应该是激励人类和睦相处的元素。我记得多年以前,准确地说是2006—2007年,当时联合国大学在研究一个项目,是在西班牙巴萨罗那创设一个研究与培训中心,旨在推动文明的联盟(人类和谐)。联合国大学董事会认为这个新机构的组织结构要考虑到教育、青年、移民和媒体政策可能起到关键作用,帮助减少跨文化间的紧张,在不同社团之间搭建起合作的桥梁。讨论的结果是,提交了涉及四个话题的行动计划。这个新的国际大学文明联盟(UNU-IAC),应当“就学校和大学课程、教材开发等向国家部门提供建议,强调课程与教材内容要加强国际文化对话,文化多元需求和人类多元需求,这些都是大学需要捍卫的人类财富”<sup>[4]</sup>。该机构于2009年设立,但是,由于在主办国西班牙发生了政治

变动,遂改了原来的名称,具体行动也受到限制。这些变动表明了我们所提到的文化多元对话等概念在机制、规则方面都面临困难,包括政治的。当前,除了哲学思想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外,教育商业化的倾向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理想视野和路径的最大障碍。

事实上,当今的世界现实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那种理想主义的想法和行动是乌托邦。乌托邦的主张是不是就认为任何目标都可以达到?但是,所有的知识分子、教师和教授们都要依赖于某个位置,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接受唯金钱、金融权力以及排斥异己的价值观?这当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的姿态。

如果没有乌托邦思想,人就无法生活。不追求乌托邦,希望就会死亡。可以说,乌托邦就是前辈探索者的北极星,没有乌托邦,我们就不能引领社会生活走向更公平的状态。忘记那些幻灭的先知预言家,不要理会那些没有灵魂的专家政论者。敢于梦想,脚踏实地,把命运握在手上,这是我们给全球那些为大学负有责任者的建议。

那么,就有人会问,从这一视角看,大学如何可以对人力资源的优化管理作出自己应有贡献呢?要说管理,在这些由联合国组织的有关社会热点问题的重大世界会议期间,有一个共识是,应对实时挑战,促进人力资源发展,承担起教育与培训的重要角色。

对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必须要适应经济领域、技术和国际交流方面的变化,要记住,在所有这些领域的行动中,整个社会的利益应该放在首要位置。并且,非常迫切地需要加强人类相互尊重的价值观,而教育和培训恰恰是所有事业中最根本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高等教育的重点应该是什么?那就是,有效地应对21世纪的需求,优先发展专门知识、技能和能力,在努力预知未来,学会做人、学会生活等人文主义方面采取行动。

在我看来,高等教育恪守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原则是必要的,但是也要承担起教育的社会责任。这个路径,尽管实施起来会复杂,但对学术实践有着直接的、深远的影响。它要求消除学科的割裂区分,避免过于自我封闭于象牙塔的倾向,我们应该努力和整个社会群体建立有效的、真诚的伙伴关系。

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前,让我们

回顾高等教育角色与民主相关的几个方面。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民主做到什么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高等教育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观点。或者说,高等教育是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的。这种唯意志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高等教育是解决问题的要素之一,我们需要所有层面的协同努力,从小学的初级教育到大学的高等教育。

对当前全球局势的分析显示,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刺激整个国际社会去面对深层次的变化。尤其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全球化已然成为事实,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已经成为社会组织中的关键因素。各个公司结构中的变化显而易见,反过来,劳动力组成也相应变化,多样、变换是普遍现象。政府正在失去它们的功能和权力,它们与公民个体的关系因此也与往昔不同;新的角色在出现,市场正成为各国与个体之间组织联系的优势力量。在这方面,高等教育能够做的很多,尤其可以厘清世界各种新现象的本质。

如果认为这种社会演变不会对教育有什么冲击和影响,那就太幼稚了。高等教育向商品的转化,多种制度的产生,其目标根本上是销售产品,这些都影响着高等教育机构和制度的组织方式。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观点为一些“新思维者”所拒绝,也有许多人持中性态度,这事实上代表一种非常具有意识形态特色的态度——支持那些控制经济的力量,并且鼓动教育向商品的转化。一些国际机构的行动代表了这一方向的关键要素,一系列朝向垄断机制的国际评价和认证其最终目的也是如此。

但是,让我们坚定这个认识,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项目的角色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在专业人士和管理人才的培训和再培训等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并且,如上面所提及的,高等教育对各个层次、各个类型教育的进步,也是非常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也要为塑造文化、培养民主进程作出贡献。当经济发展越来越建立在高级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培训出具备高技能的人力资源一度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可以达到最高标准的高等学习和研究机构,根本没有希望掌握和应用最新

的技术,更不必说对科学进步作什么重大贡献。只有通过发展自主创新技术和能力,它们才能弥补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降低对不断持续的外国技术帮助的依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高等教育项目的针对性,并且声明没有针对性,就没有质量可言。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即便没有此意义上的垄断,也可以被认为在当前人类世界的中心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我们再回到乌托邦的问题。所有的分析家、学术社团的成员、所有政府代表、所有国际组织公务员和所有这些认同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应该继续被视作公共服务的有识之士,被看作是今天乌托邦思想的创造者和捍卫者。所以我要说,“乌托邦可以成为现实”。我们只要知道在哪里,怎样寻找它们就足够了。

杨:高等教育要把质量放在首位,高等教育需要保持卓越,这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国高等教育近20年来历经了一个与别国不同的“特殊发展过程”——大学规模急速扩张,政府高度主导,就此您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何评价?

迪: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因为我访问过中国至少8次(包括3次去澳门和香港),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取得了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近30年GDP年均增长高达10%,甚至在全球遭遇经济发展困境的时期,也可以达到8%,而一些发达国家却是零增长。

经济前景就是事实。今年6月的访华让我看到了这个国家在各个领域发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和发展,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到管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是多么困难。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社会对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人力资源需求增长,这对高等教育有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高等教育系统的录取高速增长,同时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的调整需求。当然,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形势确实没有那么容易。今天,中国有3000万在校大学生,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大学根据新形势来调整与转换体制,以保证新的体制中每个人都在市场中尽其才,当然这也是极端复杂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官方努力保持公共产品的原则,设立了诸多项目以确保高等教育对所有年轻人开放,不受他们的经济状况限制。并且,对那些致力于未来成为教育工作



者的师范类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中国政府也重点关注有关国防、国家重点企业,以及重点民族研究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出现就业困难是情有可原的。对外国观察者而言,这是个重要的因素。西方发达国家和大多数新兴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一困境。

关于自治的问题,也很复杂。许多国家用立法来规定大学自治,甚至写入了宪法。但是,事实上它们是如何运行呢?有多少大学拥有真正的自治?

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建议每一种体制都要根据当前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来定义它们的使命。我们在考虑这些建议的时候,不要忘记大学的使命和发展的质量是最根本的,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或缺。这些使命要求大学必须找到路径去实施学术自由这个概念。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通过了《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第二十六和二十七条强调:所有的高等教育教师应当享有思想、信仰、言论、集会等自由。高等教育教学人员被赋予学术自由,可以自由地开展教学和讨论,研究、传播和发表研究成果,而不受任何教条限制,可以自由地对所在机构或系统发表意见。履行教学、研究职能而不受任何歧视,也不用担忧会遭受来自政府或其他来源的压制。<sup>[5]</sup>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却未曾获得良好的学术环境。这就带给我们更深层的问题,也就是自治的概念,在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条文。

自中世纪大学在欧洲的出现至今,自治和自主是大学的重要理念。其含义有几个要素:研究自由、教育自由和自我管理的权力。总的来讲,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当仅仅抓住这一目标,组织、管理它们的资源,自由的研究和组织教学。但是,我们已经走过中世纪,全球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自治作为主权的同义词,或者说不被限制地拒绝向社会解释的权利,越来越遭受挑战。大学应当是自由的,自治的,还应当主动适应社会变化。

混淆自治与主权的概念对于学术生活可能有负面的影响。1942年,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里约热内卢近郊小镇佩特罗波利斯去世之前不久,完成了自传《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记忆》,在书中说“党卫军”在校园里驱

散集会,在夜间袭击他们的对手,威胁他们,并且在肢体上打击他们,迫害学生社团,在学术豁免的外衣下,用暴力建立起恐怖制度。对我们拉丁美洲,自治也是个神话。甚至当初的军政府独裁者和保守党政府都曾经说过他们希望尊重大学的自主。在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兑现承诺,有些国家甚至以自主办学的名义停止财政拨款。

劳伦特·施瓦兹(Laurent Schwartz)在1987年给国民委员会做的题为“新社会大学”的报告中指出:

人人都谈自治,却不能真正做到,因为大学没有财政的自主权;大学获得自治权是非常必要的,项目必须是多样化的,学生和教师的录用也必须是多元化的。在我们的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国家里,大学自治不可能是那么激进的,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推进,有尝试也会有失败。大学自治,要求大学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层(当前的政务格局下是不可能的),并且许多的评价既有正面的鼓励也有负面的批评。国内的和国际的竞争是更好的自主调节。<sup>[6]</sup>

如果学术界在定义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时能更多考虑到社会需求,他们将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当前所做和未来期望他们所做的工具。这样的相对性将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有一个现实的观点引导他们的行动,高等教育将会更加开放,他们将牢记其教育目标是与其公共产品属性相一致的。在当前,社会越来越商业化和层级化,当局可能考虑放弃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概念,而将之转换为商业产品。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乐意),大学可能会享有真正的自主权。

杨:现在很多中国大学都关心世界大学排名,并且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参照来谋求自身发展。您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界流行的大学排行榜这一现象?

迪:作为一名教育者,我认为这是个错误的做法。中国不需要去模仿外部的模式。中国历史悠长,中国大学也经历了不同的模式,曾经复制

劳伦特·舒瓦兹,犹太人,出生在法国巴黎。著名数学家,供职于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分配理论的先驱。20世纪80年代,法国设有国民委员会作为评价机构,是一个自主性团体。其成员由法国总统密特朗任命,他们都来自社会高层次人才。1987年,这个委员会发起了一个综合报告,由法国文献出版社出版,身为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劳伦特·舒瓦兹教授为本书前言作者。

过欧洲模式和苏联模式,都以不太成功告终,最终中国只能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尊重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对世界大学排名所做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种排名往往会被转换成一种高获利的产业,需要加以警惕,而且这一评价体系聚焦在某些高等教育机构的特定情形,过度依赖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的标准,不一定可取。

2013年5月17—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了一次有关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排名的会议,有来自70个国家的250多人参会。在大会提交的文本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做了综合解释:“最初被用作一个信息工具,旨在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透明的要求,国际大学排名已经逐渐被看作是质量工具,并且刺激了机构之间的剧烈竞争。”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出口产业,学生的全球流动成倍增长,大学评价已经被转换为政策工具,影响着高等教育院校的决策、学术队伍、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

今天,这些主要排名结果确实直接影响到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荷兰和丹麦,为来自世界排名前300的高校学生迁移提供便利;俄罗斯最近批复了90亿卢布的资金,为那些排名较好的大学提供支持,鼓励他们与全球最好的大学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中国政府也在资金和政策上大力支持“985”高校;澳大利亚的大学聘用国际知名专家优化他们的大学形象。为了抵御这种影响,欧洲人已经决定创设自己的排名体系——the U-Multirank(多维全球大学排名),保障他们的大学可以进入最佳大学之列。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只有16所中国(包含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大学进入世界大学排名的前500名。2012年达到42所,其中5所进入了前200名。

在我看来,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迫在眉睫的任务是:

——确认它们在履行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批判使命时严格遵循构成其使命的原则;

——衡量它们的工作如何促进社会进步,如何建构公民身份,如何促进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之间的融合;

——衡量它们的行动如何为和平与理解服务,以取得全球共同生存的理想。

例如,关键之处在于,对一个大学来说,如巴西前总统卢拉在他的政府上任时所创设的“联合实验室”(the Uni-Lab),鼓励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对于这样的大学机构,数一数它们的教师在盎格鲁·萨克森刊物发表的文章,或者有没有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大用处呢?

在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参与者通过的行动计划中,关于高等教育使命的定义,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些大学机构来说,有必要规划或者重新规划它们的使命,厘清行动目标,设计一个基本的评价工具,保障每个大学具体项目和功能的实现。如果高等教育机构使用这种性质的工具,他们就能够以更合法、更客观、更具体的方式,组织他们的内部评价,也将能够坦然面对外部评价。如果这个工具的目的是确认高等教育机构使命的基本元素是否在具体行动中得到考虑和体现,这样也会更有意义。换句话说,这样一种衡量将代表维护高等教育质量的定义,也将保障其评价不仅仅基于那些来自小部分国家的元素,因为这一小部分国家主导了全球范围新知识的产出。

现代大学更需要承担起服务社会的使命,培育出一大批具备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专家、学者,训练年轻人,并致力于改进社会制度,应对时代需求,使我们人类生活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世界方面变得更美好。

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也亟需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改革。根据您的了解,我们的教育改革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迪:我已经提到,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定义或重新定义他们的使命,要与社会的各个层面相结合,包括政府、议会及不同的协会。

大学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高质量的教育项目,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解决社会问题,为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服务。因此,高等教育改革,质量和评价方法应该受到广泛关注,以对社会有所交代。具体地讲,高等教育达到高质量、高水准,主要在于其针对性,“高等教育机构所提供的项目要适应于社会对它们的期望,要求高等教育强调自身的贡献要从社会整体出发,实现教育体制的全面发展。换句话说,就是高等教育努力寻求进步以解决社会迫切问题,尤其是那些关系到和平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捍卫文化多元性和对人权的尊重<sup>[7]</sup>。这个目标的取得需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两方面。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对实现这一目标是非常重要的。1998年巴黎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达成的一项共识就是,高等教育要去塑造未来。高等教育机构应当加强它们的批判功能和未来意识,要实时地分析不断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提供给社会以预测、预警和防范。从这个方面讲,它们应当享有全面的学术自治和自由,全力以赴为社会负责、尽责。

当然,确保青年学生可以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学生的资质、能力和动机应该是决定他们进入高等教育的衡量依据,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家庭财务状况、性别、语言、政治及宗教信仰等差异而对他们关闭高等教育的大门。

杨:如果说大学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那么大学生就是这台发动机的齿轮。您多次强调大学服务社会,培养青年一代的使命。这让我想起哈佛大学哈佛·刘易斯教授所著《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您如何看待大学“追求卓越、不失灵魂”这一美好愿望?

迪:首先,你提出“卓越与灵魂”的主题,说明你对大学使命进行着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的第二大国。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今天正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也正在影响着世界的变化。大学是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和铸造厂,更是先进思想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但是,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在大学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等方面显露出一些问题,如大学行政化严重、教授治校缺失、资源配置失衡、公平与效率冲突等。当然,对于这么一个人口总量的国家又如此

快速发展,遭遇困难是必然的。今天,中国的官方清醒地看到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而且有信心加以解决。

我们说追求卓越,更多指的是学业优秀、能力超群,相对而言,灵魂强调思想高尚、道德双修。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就业情形也随之而变。兼职工作、特定期限合同、临时合同、无酬劳或低酬劳实习合同等新的趋势不断更新,数量、种类繁多。所有这些工作模式层叠交错,导致了就业的偶然性增加,使就业越来越脆弱。这种现实挑起了劳资双方的关系变化,劳动力一方的弱势日趋加剧,行业协会已然失去了人力移动和谈判的能力。不确定和不稳定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新进入职业市场的年轻人感觉无助的一个因素。如果从伦理道德的路径分析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我们可以明白,修正价值尺度是必要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大学作为理性的组织,比政府更能在修正和塑造价值观方面有所建树,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它们的产品——卓越而又有灵魂的青年去推动历史的车轮。历史上看,政治更容易为既得利益集团掌控,他们往往把集团利益放在首位。而大学历经不同的朝代、政权和制度,始终屹立于人类文明的前沿阵地,不仅承担着培育青年、发展知识重任,更承担着社会道德批判职能,引领人类文明积极向上。

中国是如此一个大国,人口总量又如此之众,所面临的问题繁巨可知。这些年,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不仅希望大学能增加录取学生的数量和提升研究水平,而且培养“追求卓越而不失灵魂”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指望。

杨:感谢迪亚斯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迪:感谢你和苏州大学诸位老师为我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机会!

## 参考文献

- [1] Marco Antonio R. Dias. Higher Education : Vision and Action for the Coming Century[ J ]. Prospects : Quarterly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1998 ,28( 3 ).
- [2] 陈至立. 深刻变革中的高等教育[ J ]. 神州学人 ,1998 ,( 11 ).
- [3] UNESCO. Declaration about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Plan of Action[ EB/OL ].[ 2015-07-30 ].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35/113531Eo.pdf>.
- [4] Marco Antonio R. Dias. Utopian Realism I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B/OL ].[ 2015-06-21 ]. <http://www.>

mardias.net/site2010/?page\_id=1610.

[ 5 ] UNESCO.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Higher-Education Teaching Personnel[ EB/OL ].[ 2015-07-30 ].  
[http : //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02/110220e.pdf#page=32.](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02/110220e.pdf#page=32)

[ 6 ] Laurent Schwartz. Où va l'université[ M ]. Paris : Gallimard , 1987.

[ 7 ] UNESCO. Beirut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rab States for the XXIst Century[ EB/OL ].[ 2015-07-31 ].  
[http : //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33/113345e.pdf.](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33/113345e.pdf)

## **Trends,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An Interview with Marco Antonio Rodriguez Dias**

*Marco Antonio Rodrigues Dias*<sup>1</sup>   *Yang Xi-chao*<sup>2</sup>

( 1. Di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f UNESCO, Paris Meudon 92190, France;

2.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

**Abstract :** Through the live interview and further email correspondence, Professor Marco Antonio Rodriguez Dias, the former Director of Higher Education Division of UNESCO, expressed his viewpoints on some hot issues over higher education. One point is that higher education is a public good and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n ideal system for our society by offering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high-relevant programs for youngsters who have fundamental merits.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universities are expected to cherish and protect the essential spirit of academic independence, setting refined modes for future society and assuming the role of promoting peace of cultures worldwide. The third is that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reat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college cooperation, and mobility of talents, as well as inter-cultural integration. However, it is vital th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retain national independence, rather than passively follow the modes set by some privileged nations. In addition, Professor Dias appreciates the drastic progress tha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made in the passing decades, and has raised his expectation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well-being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 higher education; new trends; public good; social responsibility; university autonomy

[ 责任编辑：罗雯瑶 ]